

“中国精神”的文化—实践自觉

袁祖社

(陕西师范大学 政治经济学院哲学系, 西安 710062)

摘要: 置身“后文化时代”,面对普遍的心灵失序和诸多生存困顿现实,以及知识界元话语创制能力上的缺失状况,中国人文学学术话语建构的战略制高点和有效的策略选择,当是以引领民众集体性精神生活突围的使命感,自觉地回归“文化母体”,回到具有意向性意义悬设的纯良型的思想姿态本身。从人之为人之优雅、高贵、自由的精神性存在本质的高度,着眼于公共性的文化自觉意识,立足新“中国精神”这一核心主题,努力展现复杂的新历史理性生成进程中“中国精神”自为构成的生成路径、内在逻辑、谱系图式、攀升高度,以及现实合理性内蕴,从而在对民众人格关怀和境界养成等普遍的精神福祉的意义上,实质性地促成一种具有真正典范意义上的话语革命。

关键词: 中国精神;学术话语;公共性;思想语法

中图分类号: G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12)05-0014-11

百多年世界历史变迁、百多年中国思想嬗演,我们目睹并经历了足以令人眼花缭乱的一个个学术思想和观念的万花筒,其话语之“新鲜”、切入视角之诡异,其叙事与表达方式之别出心裁,其剖物析理之“深刻”、“有致”等,一次次地不断吸引、刺激、震撼、改变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的视听、神经和心灵,足以扰乱我们原有的学术自信和思想阵脚,足以使我们的文化“失魂落魄”。

从现代性历史进程中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现状来看,现实中大多数中国人很少能静心领悟呼之欲出的新历史理性场景中“精神灵性”、“自由信仰”以及“心智健康”、“精神品质”等这样的概念。由于一味将思想专注于动物本能和物欲层次,因此,我们思想尚无法达到生命存在的一个更高层级。

回眸一个多世纪的思想较量和学术博弈历程,在“学术乃天下公器”的意义上,上述情境不能不使我们对中国人文学学术研究的境况展开慎思明辨的追问:我们找到了自己的学术立场了吗?我们学会了个性化的学术表达方式——原创性的学术话语或学术典范了吗?我们发现、创制和形成了有自己特色、追求和叙事风格且与我们民族

的精神生活、精神气质和风格相匹配,且对我们民族精神生境有高度涵括力和足够解释力的人文学学术话语了吗?

痛感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之缺失,是一代中国学人学术理性觉醒和自觉的标志和集中体现。近年来,思想与话语的贫瘠和对现实解释和约制的乏力,使得愈来愈多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认识到,必须集中全体人文学者之智慧,致力于中国既有学术传统的反思和新学术规范的创制和建构。这一努力所指,旨在吸纳现代先进学术之精髓,从根本上革新我们之积弊。

那么,从何种立场和角度切入来重构我们民族的人文学学术话语和规范,却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难题。我们认为,一时代之人文学学术话语的危机,其背后,实质上是该时代之精神追求遭遇严重困顿的表征。因此,对人文学术话语的追问,必然同时伴随着对某种类型的“精神”的反思、追问,也可以说,此两者本质上就是一回事。同样道理,一国、一民族之学术话语,往往是(承载着)该国、该民族所应有的独特精神追求的理性表达和渐次呈现。

收稿日期:2012-03-18

作者简介:袁祖社,男,陕西兴平人,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

社会变革、繁荣和文化进步的实质,本质上应该是具有独立、高尚精神追求、意志品质和自由高贵人格的一个个“大写的人”的被锻造。如果一种富裕是以一代人精神的“荒芜”和人性至为高贵的部分——美好信仰等的丧失为代价的话,那么,其所生成的历史理性和意义一定是负面的。

精神的进步、自我的拓展是一个艰难痛苦又充满反复的过程,这是一种被称为“文化”的精神事业。按照黑格尔的理解,文化就是字面上的“训练”,文化中的自我充满了痛苦的体验,唯有通过承受文化的痛苦,卑贱的自我才能变得高贵,并且事实上已经高贵了。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认为,历史的进程乃是精神的自我实现的过程,它通过个体与外部的社会权力(国家的政治权力和财富的权力)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来实现。个体的意识最初是和外部社会权力完全和谐的,个体意识对外部权力是黑格尔所谓的顺从的服务,它有一种“内在的尊敬”感;黑格尔将个体意识对外部社会权力的这种顺从一致称为“高贵意识”。但在黑格尔看来,精神的本质是寻求“自为存在”,也就是说,精神要从限制性条件中解放自身,争取自主自为。

在我们这个时代,关注人文学学术话语的建构,这是“面向思想本身”的事情。其实际关切所指,则是“后文化时代”的纯良型思想姿态与优雅性生存境界之深彻之思。近一个世纪以来,受制于因历史、文化和社会传统所造成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的后发劣势,我们在寻求本民族繁荣、富强、文明等复兴之路的选择上,自觉不自觉地变成了西方现代化实践的追随者,变成了“现代性文化”的崇拜者。

反思百年来中国学术话语的形成和展现史,我们发现其中充满了因强烈的异域话语以及思想范式的冲击带来的局促、困顿和不确定感。远的不说,单就改革开放以来的观念现实而言,随着各种外来学术思潮、观念和思想的涌入,随着大量学术著作被译介,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呈现出一派

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观。我们曾经或者一直一直以来沉浸于由“他者”的话语所营造的思想氛围和学术场域之中,津津乐道于不遗余力地传播、解释我们自认为的一部部学术“真经”,有些甚至被我们奉之为“经典”或“典范”。我们同样乐于(其实是思想缺乏深度或者因文化惰性所导致的学术懒惰)要么对外域学术主张之“生吞活剥”,要么直接吃“现成饭”。如此,原本就不成型的“中国精神”,反而遭遇极大的解构。

这样一种学术作为的结果,是“中国精神”严重的不在场和逐渐消失。透过繁荣万象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我们能感受到所谓“希腊精神”、“印度精神”、“美国精神”、“法国精神”等等,唯独不见“中国精神”的影子。当代西方思想界以批判的实在论为理论标识的著名哲学家尼古拉·哈特曼在其关于“精神哲学”的研究中,明确提出了以三种存在形态呈现于我们面前的精神:人格精神、客观精神和客观化了的的精神。所谓人格精神,在哈特曼看来是最直接地出现于我们淳朴目光面前的。在这里,精神的单位是个人人格。这种精神的主要特征是偏离性,即从兽类受冲动和环境支配中解脱出来。所谓客观精神,哈特曼指出,客观精神(超个人的共同精神)也是活生生的历史实在,它特别是对于历史的考察方式最直接地显露出来。因为从历史观点看,个人人格就要后退,而历史观点却更多的是指向个人所处的状况;事件和变化大规模地进入考察者的视野。当人们谈到希腊精神、文艺复兴精神,一般地谈到某一民族的精神的时候,指的就是这种客观精神。而“客观化了的的精神”“作为第三个形态包含由精神从自身中‘展现出来的’各种客观化:变成法典的法律,用语言和著作记载下来的学识,艺术作品等等。人格精神和客观精神是活生生的精神,而客观化了的的精神却不是活的东西”^①。依据哈特曼,我们生存于其中的现实,本质上是由种种“精神”主动参与而历史地构建起来的,精神是文化母体的血脉,却常常招致遗忘或忽视。百年中国学术演进历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我们

① 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上卷,王炳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97—301页。

似乎不屑于或者因沉醉于“看起来很美”的由异域文化所造成“非我的境遇”中,丧失了应有的文化立场和判断力,无力去观照我们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现实”,似乎不愿意从当下的“日常生活”现实,提炼、总结、升华我们的“学术”、思想,而甘愿充当“学术洋奴”或者“学术买办”的角色。《南方周末》曾经围绕“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吗”的主题展开过激烈争论,其中崔卫平先生的一篇《我们的尊严在于拥有价值理想》的短文,提出了“清点我们的人性财富”的话题,引起学者广泛共鸣。她指出,在我们今天“社会现代化”已经初具规模之后,在我们已经解除了极度的物质匮乏之后,还能做什么?还需要什么?她认为关键是“人性的锻造与刷新”:“问题是否可以这样提出:在我们进行了一番如此浩瀚的改造世界活动的同时,我们作为人,是否也有可能重新被创造出来?在我们重新安排世界之际,是否也有可能产生一番不同的人性面貌?或者在我们人性小小的范围之内,是否也有一片需要打造的天空?”^①以笔者浅见,“人性的锻造与刷新”,直指“中国精神”,直指中国精神思考框架下的中国学术话语的重建。

一个时期以来,囿于“实用理性”的文化特质主导下中国人特有的总结经验的知性思维模式,我们总是乐于从西方理论的角度奢谈所谓“中国经验”、“中国特色”、“中国模式”……这样坚持的结果,已经被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最终只能掉入西方人的逻辑陷阱里,陷入文化与人学价值论意义上“模式”甚或“制度”等的孰优孰劣之争。

从中国人文学学术话语自觉意义上,我们迫切需要并且能够充分挖掘和充分展示的,恰恰是“中国精神”。中国精神是中国文化的“主心骨”,是中国所进行的前无古人的伟大变革实践赖以顺利前行的重要的“定位罗盘”。从对“中国精神”之生成路径、生成方式和既有形态进行全面反思的角度有效切入,意味着我们开始可以理智地绕开不同价值观念之间的争论,既可以抛开曾经的“冷战思维”带给我们的困惑,也能使我们摆脱以往受文化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争所形成的凡事

都分“东方”与“西方”的简单分类的约束,从而能够使一代中国学人从一个更加宏大的历史高度,从横向来观察中国,观察中国近几十年来的风云际会中深刻的历史与文化变革。

“中国精神”出场的结果,亦能够启发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和人民从中悟出对自己民族发展有启迪意义的东西,能够让世界更加充分地理解中国历史与思想文化的精髓,理解中国人民,理解中国的发展。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程,中国初步实现了民族崛起的愿望。实际上,一国人民不可能在什么都没有依托的情况下,创造出世界级的奇迹。正如美国是在美国精神的引领下实现大国崛起一样,中国崛起的背后一定也有我们正在寻找着的“中国精神”的引领。

“中国精神”应是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建立的逻辑起点和切入点。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之建构,理应与中华民族之现代精神信仰——中国精神特质之形成和确立相同步。中国人文学学术领域已经有许多学者提出要研究梳理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发展的精神因素,探究一代中国人精神生活发展和精神世界的成长,梳理时代精神、民族心理、生活态度、道德情操、审美趣味、价值取向的发展变化等问题。^②

中国精神反映和体现的,是中国的国家形象的根本;它折射的,是一个民族的大写的整体性人格境界。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中国人文学学术话语建构立足点的“中国精神”就不仅只是中国学人集体努力进行纯粹智性建构的产物,它同样是一场实践性的伟业。

—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不必担心中国的崛起,因为她不向世界输出思想。”且不论撒切尔夫人出于何种目的做出这种独断,但至少,她做这番论断时,是以欧洲文化优越者的姿态和心态,以普遍的西方对东方思想的绝对话语霸权为立场和自信支撑的。

① 崔卫平《我们的尊严在于拥有价值理想》,《南方周末》2007年1月22日。

② 董世骏、何锡蓉《中国发展的精神因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精神”被西方主流学术思想一致认定为是文化和价值的唯一实在的本体。人类文化的历史从根本上来讲是人类精神的历史,精神造就了人类的文化。早期希腊文化尽管有各式各样的纷争和冲突,但其内在的精神还是和谐的与宁静的,希腊精神被史家称之为“美的精神”。美的精神还停留在感性,所以还是一种自在的、尚未展开的人类孩提时代的精神。希腊被强大的蛮族灭亡以后,一种新的精神取代了古代的希腊美神,那就是基督精神,基督精神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转折,它把人类精神中的内在神性展呈出来了。但是,由于其重心放在“彼岸王国”,对现实世界采取排斥的态度,因此,最终导致了基督精神的二元分裂。在基督教的裂缝处,近代人文主义潮水般地涌现出来,藉此近代的“市民精神”取代了基督精神,创造出一个近代的资本主义文明。但是,由于近代人文主义没能张扬人的内在神性,还是一个有限的人类精神,而这种精神的有限性是与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本性相矛盾的,有限的自我不能肩负起创造世界和创造历史的重任,因此,在近代人文主义的落潮中,一轮新的精神登场了,它就是德国19世纪的文化精神。“德国的精神”是人类精神的最乐观、最豪迈、最危险、最富有戏剧性的写照,作为统一的精神力量,它贯穿于18世纪末德国启蒙运动之后的整个19世纪的文化。这里不能不提到尼采,尼采基于对“权力意志”的规定和对自由的独特理解,认为精神有三种变形“我告诉你们精神的三种变形:精神如何变成骆驼,骆驼如何变成狮子,最后狮子如何变成小孩。”^①首先,精神是骆驼,“因为许多重负是给精神,给强壮忍耐而中心崇敬的精神担载的:精神之大力要求重的和最最重的担负”^②。这意味着自由的第一个历程正是生命本能的健壮。其次,精神是狮子,因为“他想征服自由而主宰他自己的沙漠”^③。为了获得自由,精神总是否定从前的价

值,从而创建新的价值。因此,“他要与巨龙争胜”,要将从前的一切价值所规定的“你应”的义务,变成“我要”的自由。所以,为着自由、为着创造,精神仅仅是骆驼已不能胜任。于是“创造自由和一个神圣的否定以对抗义务……这是狮子的工作”。而“创造新价值……为着新的创造而取得自由,——这正需要狮子的力量”^④。再次,狮子是小孩,因为“小孩天真与遗忘,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游戏,一个自由的轮,一个原始的动作,一个神圣的肯定”^⑤。精神的自由就是在破坏现有价值的同时,又创造出新的价值中实现的。正是在这样的创造中,精神将自己的意志体现了出来。所以,尼采说“为着创造之戏,兄弟们,一个神圣的肯定是必要的:精神现在有了他自己的意志。”^⑥尼采是借小孩比喻集破坏者与创造者于一身的理想新人。

简短的学术史考察清晰昭示,人文思想的逻辑,其实就是学术话语自己构成自己的逻辑,它在深层意义上构成民族文化学术之独特的叙事和表达方式、独特的精神追求。探究中华民族以及中国人的“精神性存在”的历史脉络、谱系图语、内在逻辑及其现实合理性,以观念的方式演绎中国人精神心性、人格境界等的成长和不断攀升的历程,是当代中国的人文学学术话语建构的核心使命和中心议题。

中国学术话语的重建,首先是与对历史发展过程中所生成的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精神寻索的历程相一致的,这种寻索伴随着“中国精神”——中国学术思想的出场和展现方式。这是一个持续地挖掘中国精神的本有元素,整合其他文化的合理成分,从而自觉地创生新的“中国精神”的过程。诚如有的学者所言,一个能够广泛地影响世界的大国,一定是一个思想家辈出,在参与世界知识体系建构的知识生产中,不断推出新的整体性

① 尼采《查拉斯图如是说》,严溟译,北京: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21页。

② 尼采《查拉斯图如是说》,第21页。

③ 尼采《查拉斯图如是说》,第22页。

④ 尼采《查拉斯图如是说》,第22页。

⑤ 尼采《查拉斯图如是说》,第23页。

⑥ 尼采《查拉斯图如是说》,第23页。

思想体系的国度。“更直接地说,就是不再拼凑他国的思想文化百衲衣,而是以中国经验和中国元素建构社会生活理念和生命价值观,成就自己文化形象的整体高度和阔度……”^①

从理念型意义上审视,自20世纪初以来,实际主宰中国人文学术的思想话语单元及其相应的叙事方式,充满了矛盾、紧张、冲突甚至深刻的“悖论”。如果说自20世纪初叶以来,中国学术话语的核心是东西两种文化的“体用之争”问题的话,那么这场争论延续至20世纪90年代,问题又以中国学术话语建构中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再一次呈现。按道理,既为“中国学术话语”,那么就必须立足中华文化的本根,以与西方话语进行平等对话和交流。但问题是,从文化精神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原本所代表和体现的分别是两种不同的主体精神。依照学界通用的说法,一种我们通常把它叫做“协调的现实精神”,另一种我们则把它叫做“超越的浪漫精神”(一名之曰“伦理文化”,一名之曰“宗教文化”)。前者注重于内在的道德修为,后者则注重于人和上帝之间的一种超越的信仰。这两种文化首先存在着致思路向和学理旨趣等方面的深刻差异,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相互为用,相互助益,必得做许多扎实的话语转换工作。

对中国精神的把握,不能脱离中国社会历史、文化以及在这种历史文化情境中生活着的中国人的存在现实。现代许多学者尝试着为“中国精神”的内在特质、形态等进行把脉、诊断和界定。一是张岱年先生所谓中国几千年来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及其主要内涵: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自强、以和为贵,实质是“创生论”——以“生”为中国精神的本根。先生以《周易》中的“天行建,君子以自强不息”为基础,将中国文化的精神理解为生生不息的文化。二是李泽厚先生的“实用理性”论。认为此乃中国文化、中华民族从而“中国精神”的根本——以“用”为中国精神的本根。所谓“实用理性”,不同于康德的“实践理性”,它其实就是对伦常日用、对百姓寻常生活、生存问题

的关心而已。三是张立文先生所谓“和合文化”及其所体现出的和合精神认定,以“和合”为中国精神的本根。而钱穆、林毓生、唐君毅等先生则倾向于认为,中国精神的核心是人文精神,中国人文精神的核心是“对人的尊重的精神”,除此以外,还有所谓“注重和平的精神”、基于现世又超越现世的“超越性精神”等等。当代文化学者许纪霖先生从思想史的角度,着重对19世纪中叶之前的古代中国到20世纪90年代这一历史时段,中国精神的逻辑演进历程,做出了精到有致的理论梳理。依照他的看法,简单地讲,从古代的神圣社会,走到当代的世俗化时代,期间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演变。第一阶段是19世纪中叶之前的古代中国,那是一个中国式的神圣社会。古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是丰富和完整的,人的生活世界属于一个更高的、有意义的宇宙。无论是儒家的德性论,还是道家的自然观,抑或各种民间宗教,人的精神世界都与超越的天道、天理或天命紧密相连。第二阶段是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开始步入世俗化的现代社会。不过,1949年革命的胜利,使得中国又重新回到了一个神圣时代,一个红色的神圣时代。第三阶段是从1949年到1978年,这是一个激进的理想主义时代。那是一个非常极端的理想主义时代。无论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还是小资产阶级的理想主义,都具有极端的理想精神和浪漫气质。这些理想主义的时代英雄塑造了两代中国人的精神特征。第四阶段是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中期,世俗化重新起步,后理想主义成为1980年代的精神特征。现代化取代过去虚幻的革命乌托邦理想,获得了某种神圣性价值。在这个时期里面,最具有精神象征意义的事件,莫过于“信仰的失落”了。^②

上述诸种对中国精神的勘定、对中国精神的个性化探索,在精神生成的历史性、纵深性展示意义上,是难能可贵的,它至少为我们寻思中国精神提供了必要的、有益的界域。但令人遗憾的是,后世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智识性突破,几乎是微不

① 王岳川《从去“中国化”到“再中国化”的文化战略》,《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10期。

② 许纪霖《世俗化社会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天涯》2008年第5期。

足道的。

原因很明显,中国人文学学术话语主题的寻找和话语空间的建构,由于缺少自己的元话语,只能是西方多个观念、思想主张的简单平移,而从根本上忽视了对中国人文学学术之基本致思对象的“中国精神”的关注,没有从中国精神生活中发现、提炼和概括中国学术的元素和成分。中国人文学学术研究者不是用中国精神观照和审视其他精神,相反,却习惯于用欧洲精神、美国精神——现代性文化精神批判、构筑中国现实。长期以来,大多数中国人就生活在这种高度异己化了的现实中,逐渐忘记了自己的来路去处,被动无奈地处于严重的“精神游牧”状态。

中国学人、中国民众关于“中国精神”的体知,无法令人乐观。在物质上富裕的同时,一代中国人身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精神矮化”现象。

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考察了他生存于其中的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质,以哲人所特有的睿智,为他那个时代的精神本相和走势进行理智把脉:“……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新时期的降生和过渡的时代。人的精神已经跟他旧日的生活与观念世界决裂,正使旧日的一切葬入过去而着手进行他的自我改造。事实上,精神从来没有停止不动,它永远是在前进运动着”,成长着的精神“慢慢地、静悄悄地向着它新的形态发展,一块一块地拆除了它旧有的世界结构”^①。无疑,黑格尔对精神的逻辑和力量是充满了自信的。以此观照,中国人文学学术话语之思的使命之一,正在于用文明时代人类的优秀智慧,来为本国、本民族的精神图式和图谱进行重新编码、重构进而引领和提升。因为,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言:“人身上存有精神的元素,它不依附于世界,也不由世界所决定。人的获救并非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是自然、理性或社会的需求,而是精神的需求。”^②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学术话语建构和创新,如果脱离了这民族和时代的精神生活现状,必将是缺乏生命力和难以持久的。

三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从香港歌星张明敏唱响《我的中国心》、《龙的传人》等开始,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就已然开始油然升起。以至于有当代中国学者断然指认:“此乃中国人现代性文化体验的开始。”^③而到后来,当内地歌星和民众一致唱响《大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时,中国人对于有关“中国精神”的影像的感知似乎变得越来越清晰了。

但事实并非如此。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思想文化领域所发生的一系列深刻的变化,首先在一部分中国学者和民众中树立起了民族自豪感,体会到做一个中国人的骄傲。于是出现了许多以“中国”和“中国人”为名目的盲目的自我夸饰、自大为噱头的行为,并最终以使许多中国学者感到不可思议的一本《中国人不高兴》的畅销书而告结束。其结果,非但没有在一代中国人心目中确立一个明晰的“中国形象”,反而却出现了“中国是谁?”、“中国在哪里?”等的认同危机。而学者们辛苦建立起来的几乎成为学术质性的一个个学术规范,无一例外,竟都面临着准“合法性”根基的危机。超越学科之间的壁垒,从学术共同体所要求的基本的规范约定意义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个中国的学术思想,正面临一种可怕的话语的“无政府”状态。

随着“后文化时代”的到来,包括中国学术界在内的整个全球人文学学术话语的建构,更是处在一个非常严峻、非常艰难的学术环境中。一方面,一向被视为神圣的“精神”话语本身,无一例外都开始经历全面、持续的系统解构,以往所发现、认同和坚持的“价值”,正遭遇种种形态的深度质疑。有学者对这种现象做出了如下的概括,指出:“……典型意义上的现代人,凡事也都要问一个为什么。人们以前一般不问‘为什么要有道德?’因为即使问这个问题,答案也是近在眼前的:因为上帝或上天要我们有道德的。但对于‘凡事都要

①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页。

② 汪建钊编选《别尔嘉耶夫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249页。

③ 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问一个为什么’的现代人来说,这个答案并不令人满意,因为他还会进一步问‘为什么上帝或上天让我们有道德?’甚至,‘为什么你会相信有上帝或上天?’”^①另一方面,不仅普通民众,就是大多数人文学者,面对浮艳、繁华的世相物态,也难以固持“柴门清话”般的学术本心,对人文学术本身的神圣性心存质疑。

中国学术话语,其努力所指,当是“中国精神”的现代图像和图语,这是现代观念史和思想史意义上,一代中国人文学术整体性地向世界展示自己的追求、境界、气质、风范等的一个核心坐标原点。中国人文学术从业者正是依据此获得学术自信、学术立场,取得应有的学术话语权。没有中国精神的确立,中国学术话语的建构和生成就缺乏必要的出发点和根基。

中国学术话语构建,关键是要反映生成中的中国精神。中国精神其实并非一个新问题,但究竟什么是中国精神,它有哪些核心元素,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问题。破解此难题的一个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对中国精神的生成,做一必要的历史考察。

中国社会和历史的 精神境况,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精神世界之真实,长期以来没有引起学者足够的关注。面对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和价值并存与冲突的现实,中国学者陷入了严重的失语之中,完全不知道应向世界展示什么,不知道应以何种方式向世界展示自己。有中国大陆学者结合国外学者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观察和研究成果,对此现象做了认真的考察和分析。^②根据刘擎先生提供的文献资料,近年来,在西方中国研究中,“晚期社会主义”(late-socialism)以及“后社会主义”(post-socialism)的概念被频繁使用。既试图以此把握中国社会转型的阶段特征,同时也试图以此展开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与思想文化的研究论述。白杰明在1999年发表的《赤字:论中国当代文化》(Geremie R. Barme, 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一书中,以很大的篇幅论及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他使用“晚期社会主义”的概念来把握19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语境,提供的参照比较是1980年代东欧知识分子的处境,以此将“晚期社会主义”与匈牙利作家哈拉兹梯(Miklos Haraszti)提出的“天鹅绒牢笼”(参见Miklos Haraszti, The Velvet Prison: Artists Under State Soci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7)概念相联系,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与批判性做了相当悲观的评价。在他看来,“晚期社会主义”处境所形成的“天鹅绒式的统治”使得中国知识分子丧失了批判力。虽然在1990年代,知识分子的思想争论热烈展开——从人文精神讨论、国学热、大众文化理论到后现代理论等,但这些讨论都没有形成真正的批判性的“异见文化”。这表现在大众文化中的充满妥协和逃避的“玩世主义”,而大众文化表面上的多样性形成了一种宽松多元的文化幻觉,实际上压制异见文化的合法性。这是作者使用“赤字”作为主标题的含义之一:1990年代的中国文化界虽然话语过剩,文本超产,却缺乏真正的思想与社会力量。^③

简单地主观断定中华民族、中国人缺乏自己的“精神追求”——“中华精神”,显然是不合历史事实的民族虚无主义。认定中国历史的发展并没有生成与“希腊精神”、“美国精神”等相应的“中国精神”,更是绝对站不住脚的。问题是,中国精神的性质、形态、内容等,在当代都发生了哪些新的变化?与当代中国社会历史现实相适应的“中国精神”究竟是什么样的?简言之,究竟什么是“中国精神”?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精神”?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充满了迷茫,存在着很多待破译的“密码”。至少在当下,还没有哪一个学者能够清晰地向我们勾勒出“中国精神”的大致轮廓。

被毛泽东称赞为“民族魂”的思想家鲁迅先生,有感于“中国人失掉自信了吗”问题的思考,

① 童世骏《当今中国的精神挑战》,《文汇报》2009年5月30日。

② 刘擎《西方学术视野中的当代中国精神生活》,《浙江学刊》2007年第5期。

③ 徐贲《晚近社会主义,丝绒牢笼和知识分子政治》,《二十一世纪》(香港)1999年12月号,总56期。

早在数十年前就深刻地断言并告诫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想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即须有相当的进步智识,道德,品格,思想,才能站得住脚。”鲁迅先生显然意识到了一个民族的真正强大,在于以伟岸的精神的力量,自豪地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的重要性。看来,关于中国学术话语的建构,我们的确到了关注“中国精神”的实践理性认知和文化价值自觉的时候了。而所谓“中国精神”的实践的理性认知,其真意是指,我们必须秉持民族文化本位和开放、包容的学术胸襟,在自觉的实践论、生存、生活论的哲学意义上,对中国精神的反思和观照。

首先,“中国精神”并不是一纯粹抽象的话语符号及其空洞表达,这是一个我们曾经拥有又不幸失去的正在形成中的东西。

“中国精神”这一指称,表达和包含了太多、太重要的东西在其中。

在知识论意义上,中国精神堪称中国文化的本体和母体。中国精神是指中国社会、历史在长期的文明进化历程中所形成的对宇宙、文化和人生等存在本质的实践性体知基础上,一代代中国人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以及所体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独特的精神气质、心理特质和意志品质、人道情怀等,它是中华民族积极的生存态度与生活情感的综合彰显,并实际构成中国文化合法性存在、演化和发展的终极根据与理念依据,它引导并同时制约着中国文化的演进方向和路径选择。

在价值论意义上,中国精神代表着中国文化的价值发现方式和实现方式。它是中华民族在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相统一的意义上,对合理性社会结构和制度组织、对优良的生活秩序的向往,对优雅生活方式的追求。

在信仰论意义上,中国精神是中华文化之独特的价值理性信念的体现。中国精神所表达的,是中华民族和全体中国人在对科学信仰的主体性认同、坚持不懈地践履基础上,对整个宇宙和人类未来命运的一种终极观照,等等。

中国精神实际地体现在中国人的科学观念、伦理文化、宗教信仰以及哲学、艺术等理论之中,反映着中国人对于天人关系、人和(社群)共同体的关系、人人关系的智慧结晶。反过来,中国的各

种观念形态的东西,也必然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在走进和探究着中国精神的精髓。

中国人文学术要真正取得对中国以至外域现实的影响力,关键是要致力于对一种“真的现实”、“真的生活”的理性建构和坚持意识。所谓“真的现实”、“真的生活”,是指我们需要明确“中国精神”的原色,但这又不能脱离对中国文化之基本精神的认知。

中国精神的文化价值自觉,其基本旨趣基于对“中国问题”本身的文化与价值哲学理解。现代中国的问题,如果按照“世俗社会与超越精神”的话语方式来看的话,一般认为是“超越精神”的缺失,导致许多本土和非本土的学者习惯性地指责中国文化政治上不能为现代公民社会的建构提供约法精神和守约习惯,经济上不能为现代健康、完型和成熟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提供诚信和个人独立自由等。

这种说法认为,中国传统的儒教和道教,比较稀缺这方面的精神资源。而在经受现代“世俗化”冲击之后,更是荡然无存。所以,为了在现代中国完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就必须引入超越精神。而所谓超越精神,无非就是以本文前面已述及的所谓基督教或基督教化的希腊思想,或者以基督教为历史背景的现代主体、人权、人格概念为基础的所谓全人类共享的普遍价值。这种超越精神的诉求,在当前的中国遇到来自两个极端的挫折,一方面是在高调的理想主义意识形态失去其普遍的感召力以后普遍蔓延的犬儒主义、相对主义情绪,什么高尚的说法都不再相信;另一方面则是日益发达的市场经济大潮带来的一切向钱看、物质享乐主义的腐蚀。

其次,我们需要以面向后文化时代的纯良型思想姿态,努力追求中华民族之高贵精神和优雅性生存境界。这一努力,关乎民族之“心性本体”,关乎一种生命质感——深度、阔度和高度,关乎民族气节,关乎人格理想,关乎高远的人生境界,关乎民族之“生存意义的体验”获得方式的可能性,同时更指向一种新的人文秩序的重建。

但所有这些,似乎还不足以将“中国精神”的实质真正地、真实地呈现出来。从20世界中后期以来,许多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有感于全球化时代、

市场经济背景下“中国精神”在“过度世俗化”过程中日益呈现的“侏儒化”、“相对主义化”、“功利实用化”以及某种程度的“虚无化”现象,开始探讨所谓“贵族精神”问题。虽然学界对此褒贬不一,但我们认为,至少从“中国精神”生成的意义上,从我们思考构成新“中国精神”有效元素的意义上,从引导未来“中国精神”的演进方向的意义上讲,这种探讨不无重要的启示意义。正如学者们所指出的那样,财富的增加并不能必然带来精神的富有。改革开放三十年多来,尽管一些人达到了“先富起来”的目标,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丰富得让他们失去了选择的标准。可是安逸的生活非但没有让他们快乐,反而让一些人忧心忡忡,觉得生活的路子越走越窄,致使“心理贫穷”的人群日渐增多,个别人心理上的“穷困”甚至到了偏执的地步,以至产生极端行为。这恰恰反映了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两个层面“富者,物质之丰也;贵者,精神之悦也。”^①

所谓贵族精神是相对于平民精神而言的,它是在贵族社会形成的一种人文传统。贵族世袭制度,使贵族摆脱了衣食之忧、名位之求,而且积累了高雅的趣味,造成了超越的、自由的、高雅的贵族精神。九十多年前的五四新文化的倡导者陈独秀就曾指出:所谓的贵族精神,指的是一种高尚的人格理想,高贵的精神气质,既无关乎门第、血统,更与消费水平无关。事实上,我们这个民族生活中的诸多文明礼仪,包括最简单的礼貌用语,大多是出自他们。

中国现代性的片面性体现在单纯的经济领域的变革,缺乏文化思想领域变革的配合,尤其缺乏反思、超越的现代性的建设,于是,来势凶猛的消费主义成为新的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畸形膨胀。出现了这种现象:物质的富裕掩盖了精神的贫乏,感官的享乐取代了思想的追求,低俗的时尚排挤了高雅的趣味。这造成了文化生态的失衡,精神世界的倾斜。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的精神境遇,我们会发现,中国目前的精神境遇是结构复杂、意涵

厚重的,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改革开放后,我国精神领域巨大的变化就在于社会文化由单一转向多元,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主文化与亚文化、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等各类文化并存。主调明朗的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同各种亚文化呈现出共同发展的局面。有人曾经用“实用性、直接性、短期性、刺激性”来概括社会上流行的“文化快餐”现象。因此,针对过度世俗化社会的精神病态现实,作为一种理性之反弹,当今社会所提倡时代所谓贵族精神,从根本上说,就是肯定人的高贵性、神性、自由性,抵制鄙俗性、世俗性、消费性。

“中国精神”所追求和着力展现的,应该是历史进程中获得和造成的我们这个民族丰满、健康、高雅的人性品质,而中国人文化学术话语,就是要以人文理性所特有的方式和视野,对我们民族在这一曲折复杂的历程中的个性修为和“人性所能达到的境界”,做出富有说服力和引导性的理论创造。前苏联著名的宗教思想家、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灵魂》一文中这样说道“世界大战尖锐地提出了俄罗斯的民族自觉问题。俄罗斯民族的思想界感到有必要、有责任揭开俄罗斯之谜,理解俄罗斯的理念,确定它在世界上的任务和地位。”^②将别尔嘉耶夫这段话用来透视和审视正在生成中的“中国精神”,可谓意味深长。的确,中国人文学学术话语的建构,需要整个民族的精神自觉,它是一场中国人的精神自救和自我更新的过程,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在世界中的文化新形象。

最后,中国学术话语的建构,我们尤其需要基于“辅旧邦以阐新命”的意识,在“话语”理论自身的创新上做足工夫。依别尔嘉耶夫之见,“语词对我们的生活拥有巨大的权威,神奇的权威。我们受到词语的迷惑,在相当程度上生活于它们的王国之中。词语如同一股独立力量活动着,而且并不凭借它们的内容。”^③

在中国精神成长的艰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

① 王本道《“富”、“贵”之别》,《海燕》2008年第12期。

② 汪建钊编选《别尔嘉耶夫集》,第3页。

③ 汪建钊编选《别尔嘉耶夫集》,第83页。

学者对“分析哲学”、“现代性”、“后现代主义”、“现象学”、“解释学”等等并不陌生,如数家珍,且运用起来亦游刃有余。但唯独缺乏的是话语的新创能力和学术习惯,缺乏以自己独创的话语来把握、透视和分析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人类的生存生活处境、精神文化追求,我们没有创制学术新话语典范的气度。有学者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之严重性,从而提出了首先要有“中国”意识,然后再从事学术规范的创立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明确世界人文学学术话语格局中中国的地位和基本处境。世界结构中的“中国”的实质,不在于个性或与西方国家的不同,而在于主体性,在于中国本身于思想上的主体性“其核心在于形成一种根据中国的中国观和世界观(亦即一种二者不分的中国观),并根据这种中国观以一种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结构的重构进程。”^①

这一识见的方法论启示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人文学学术在这方面,有着深痛的历史和文化记忆。一代中国学人不会忘记,现代中国思想史上,当中国人还没有真正弄清楚所谓“社会主义”的本质的时候,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后现代主义、民族主义等已经次第俨然登台,试图按照分别代表的文化理念,粗暴地开始渗透进中国社会日常生活各领域,甚至中国文化的血脉之中,并试图从根本上重新改铸中国人的深层心理和精神气质。我们面临着话语的喧嚣,就是听不到中国思想自己的声音。知识分子是人文学学术话语重构的重要主体,话语革命的实现,这一群体责无旁贷。知识社会学理论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曼海姆曾使用“相对不受束缚的知识阶层”^②来描述知识

分子。其本意是想表明,知识分子不是天马行空、超越一切的高贵阶层,它没有“参与上天的启示”。知识分子的怀疑精神、批判意识和他们彻底的觉醒是“面包中的酵母”,不过他们“并不提供面团”。知识分子一贯反映着社会的趋向,在政治和商业的双重压力下,中国知识分子既不能满足于用别人的声音说话,也不能满足于用虚假的自我发言,更不能只在意自己一个阶层的声音。

精神的本质是自由,它在艰难的自我实现过程中不断追求自足、自主和自洽。中国精神要对当下以及未来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生存、生活等发挥其引领性、感召力、影响力等,就必须找到按其本性成为自己的恰当方式。这种方式形成的标志,就是话语资质和话语权。如同中国社会在经历“千年之未有的大变局”中不断寻找自己的坐标方位一样,中国精神势必要在复杂的观念场景中积蓄理论和势能,改变自己一直被要么单向主宰、要么同化的命运。文化学者甘阳一直强调接续晚清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基本“问题意识”,提出“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有什么样的文明抱负的问题”。他认为,如果中国只是一个缺乏历史的小文明体,如果中国仅仅满足于做西方的文化附庸,那么就不必费力想那些根本性的问题。但是中国是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体,就必须承担起自己的文明责任,必须确立中国文明的自主性。^③

诚哉斯言!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一代中国学人一定会立足新的历史高度,深刻地把握和阐释中国现实,自主地建构自足的中国学术话语的人文智慧。我们期待“中国精神”的真正复兴,期待中国人文学学术的辉煌明天。

① 邓正来《一种以中国为根据的“全球化观”的论纲》,《河北法学》2008年第1期。

② 曼海姆《文化社会学论集》,艾彦等译,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③ 杨瑜《30年人文社科话语:中国的文明责任》,上海《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7月23日。

The Cultural and Practical Self-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Spirit”

Yuan Zus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Economic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 In the era of “Post-Modern Culture” which witnesses the general disorder of the human soul, the reality of various living dilemmas and the lack of the ability to formulate meta-discourse in the intellectual circles, the commanding height and the effective strategic choice of Chinese humanity academic discourse construction can be nothing but maintaining a sense of mission to lead the people in breaking out the collective spiritual dilemma, going back to the cultural parent consciously, and returning to the pure mind posture set by intentional meaning. And they can be nothing but starting from the height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people-oriented spirit of elegance, nobility and freedom, being concentrated on the sense of public cultural consciousness, focusing on the core theme of the new “Chinese Spirit”, and striving to present the generative form, inherent logic, pedigree pattern, rising height and the connotation of realistic rationality of “Chinese Spirit” which is self-cultivated in the complicated forming process of the new historical rationality. As a result, it will be possible to promote a discourse revolution with real model significance in the sense of general spiritual well-being such as the concern for personality and the forming of spiritual realm.

Key words: Chinese Spirit, academic discourse, publicness, thinking grammar

(责任编辑 刘曙光)